

巴渝鸿爪

——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

邓照明 著 重庆出版社



悼亡友邓照明

肖泽宽

1990年8月3日永思打来电话，哽咽地告我：照明因大面积心肌梗塞逝世。这个晴天霹雳震得我茫然失魂，顿时无语，老泪盈眶。照明的身体比我好，习惯合乎卫生规律，平时很少生病。几个月前，重庆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发行会上，我们见了面。他精神挺健，和我亲切交谈过不少老战友的健康状况，也没谈及他自己的心脏有何不适，万没想到他会先我而去的。死亡，对我们既不恐惧，也非意外，遗憾的是，他走得这样急急匆匆，连弥留告别的机会也没有。是啊，悲痛改变不了事实。他那颗顽强的心脏毕竟停止了工作。一条始终为人民服务的生命，已经通过71年的检验。泰然、歉然、有憾、无憾，公自无言。后死者我，却涌起了说不完的哀思，道不尽的衷情。

此生有幸，我和照明作为战友、同事和朋友相处40余年，有过多少次生离与重逢，那情景历历在目。每次分手，他都是那副平静而旷达的微笑，投射着沉毅的目光。我相信这次死别，他也会带着同样的微笑。因为旷达、沉着、镇静

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即使在别后难保再见的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也不曾丝毫改变。何况他现在已履行了入党誓言，达到自定的标准，在死亡到来之时有权说一声无愧于民族和社会，无愧于党和人民。或者诙谐点说，有权笑脸见马克思。盖棺论定，他确实无愧于时代，堪称高尚的人，纯粹的人。8月14日他的遗体覆盖着党旗，安卧在花丛中，辞别人世。当我们——野草、伯克、德林、吴雪、怀安等在京老同志向他鞠躬告别时，我仿佛又见到他那惯常的微笑。

照明生前常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真是车载斗量，没有什么可自傲的”。我认为这不是谦逊，而是真诚的自况。放在大背景上观察，照明的道路是普通的，跟他同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没有两样，都是由爱国民主思想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大都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正如照明早就奉为圣明的《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旧营垒中的“已经提高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或思想家常常会“分化出去而归附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的阶级”。50、40年代的中国，正是接近和实行这种“决战时期”。那时只有马克思的理论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严肃认真地肩负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简言之，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谁不愿做亡国奴，谁就不能不归附于它。对于30与40年代的革命分子，这不是抽象理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照明的家庭是个不小的地主，但在20年代，他家就有几

个“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长辈。照明少时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革命。大学时代，又逢民族危机特别深重的抗战前夕，他便在母校——四川大学的救亡运动中，参加了“民先”。成都党组织刚刚恢复，他便同另外两个人第一批入党。由此，成为职业革命者。接着他激情满怀，出剑门，越秦岭，奔向延安。转赴敌后战场，挥戈杀敌。在山西，作过县委书记，又作四川代表参加“七大”。1946年衔命回川东。解放后，他的物理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组织要他放下党政工作，参与科技事业的领导，直到终生。先主持带试点意义的狮子滩（重庆长寿）水电站，后经管科学院的原子能研究和核工业建设，多次远涉重洋考察原子能和平利用的近况。按他的才智，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惜他的许多日子也“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无谓地耗费了”。

50余年来，他做一行钻一行，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才能。无论国统区地下斗争，敌后根据地斗争，工会建设，工业建设和科技事业都能成为内行，胜任愉快。这得益于他的基础——受过正规系统的高等教育，更赖于他的好学精神。他有强烈的求知欲，涉猎很广，无论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珍惜每一分钟时间，娱乐也不离求知，业余爱好是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旧体诗词。他常填词、写诗，抒怀言志，乐己娱人，陶冶性灵。他是我们党内的一位学者型的政治人才，也是政治型的学者。因此，他与中外人士交往，能以博学多识，引人敬佩，他对待同志，善于在谈笑中，广征博引，触类旁通，晓喻得宜，收潜移默化

之效。

照明是个摆脱了低级趣味的人，他的工作和学习毅力都导源于一个高远博大的认识。一次，他在激励一位积极工作却不爱学习的同志时，说过一番话：既然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既然我们相信“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实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共产党宣言》）。那么为了实现如此宏大的信念，怎么能不尽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呢？有什么理由满足于目前的水平呢？如果自己不高怎能帮助“一切人自由发展”呢？他言行一致，50多年来一直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工作与学习。主要嗜好是藏书。去过他家的人都知道，四壁满柜都是书。线装的或时装的，中文的或外文的。“文革”期间，他从“牛棚”回京，第一件事就是去琉璃厂逛旧书市场。

要全面叙述照明的经历和品质，不是我能胜任的；还是选择他生命历程的一个片断吧。1946年，四川省委书记张友渔同志打过招呼，如秀山有信，请立即转他，而没有讲发信人的任何情况。1947年，钱瑛大姐委托王璞同志与邓照明取联系，我才设法与照明见面。他当即讲了在秀山被捕的情况，神情坦然，旷达得像一位超凡脱俗的高僧。我们更密切的接触是1948年春天，梁、达、大起义失败，他带着一些同志撤到重庆。我作为川东临委秘书长应负责安排他们的疏散事宜。但我刚着手这项工作，就遇上四月刘、冉叛变爆发的大逮捕。我被恶犬追逐，离开重庆。9月王璞不幸牺牲，在这

危急时刻，照明和临委失掉联系，我们都只好各自为战。彼此都是相当暴露的人，都为对方的安全担心，但无法相助。11月我们才取得联系，并在铜梁实现约会。铜梁党组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地点，即游文俊同志家里，环境安适，照料周到。我们蛰居斗室，白天促膝对坐一张桌，仔细交流情况，冷静地分析问题。晚上一盏油灯如豆，伴我们到深夜，倦得无可奈何才上床抵足而眠。这似乎是半年栖栖遑遑之后的一次小息。不，应该说是大折大挫之后的一次从容讨论。我们决心不惜时间把问题谈透，也必须谈透。因为很难保证，今后常有见面的机会。

陶醉在“庆功”中的敌人没有想到，连我们自己也不曾料到，交谈的结果表明：我们是胜利者的会晤。照明清理和恢复了重庆和上下川东的组织，我也做了工作，保全了铜梁、合川以西及上、下川南的组织。的确由于堡垒内部的漏洞，我们受了重伤，100多名党的优秀儿女上了刑场或进了监狱。但我们并没有被消灭。而且恢复了重新战斗的力量，只是关键在于如何重新战斗。当时得不到上级指示，全靠我们自己拿主意。患难识英雄，正是此时考验了我们。尤其是照明的胆识，深一层看，应该是川东党组织全体同志的胆识。半年多来，每一个幸存者都在抚着血淋淋的创伤思考我们为什么遭到痛打的问题，提出不少正确意见，依靠全党的经验和照明的提炼归纳，我们形成了在大破坏之后的第一次总结和部署。要点是：对形势的认识上既看到全国（整体）的我强敌弱，也看到四川（局部）的敌强我弱；由此决定在农村停止

发动公开的大规模起义，也不提分田废债，而搞隐蔽的小型武装工作队，发动和组织群众抗丁、抗粮、抗税；在城市加强工运、学运、统战和情报工作，争取群众，积蓄力量，改变一味强调抽干部下乡，而是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组织方面，严格实行隐蔽、恢复单线联系，组成实际工作系统，不慌于建立集体领导——即各级党委。强调党员质量，谨慎地少量地吸接党员，着重发展外围组织。这个总绪布置，传达下去，深得全党支持。历史证明我们想的和做的，大体符合实际情况，收到较好的效果。12月上级找到了我们，照明便去香港，向钱瑛大姐汇报请示。上级肯定了铜梁会晤的精神，还从理论上指导我们分析论证，根据解放区战场节节胜利的形势，明确规定国统区党组织的任务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这是战略性的而不是策略性的转变。即从农村武装斗争，聚集军事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转到在城乡特别是在城市保存力量，护厂护校，迎接解放军，配合接管。这就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自觉和自信。从而保证1949年迎接解放任务的较好完成。

川东党在这个时期的工作，关系到四五百名干部和2000多名党员的是非功过。我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策略，做了什么事情，人们是不清楚的。加上“四人帮”的诬蔑和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偏见，面貌就更加模糊了。对此，我和照明一直都想作个交代。1980年开展地方党史研究以来，各人写过一些散篇，总嫌过于简单，许多同志的活动还没有说到。加之，在落实地下党政策过程中，

反映出来的种种令人痛心的情况，“作个交代”的冲动就更强烈了。终于促使照明提笔写了《巴渝鸿爪》。

《前言》中的“鸿雁爪痕”是照明自谦的提法，比喻他留下的不过一见阳光迅即消失的雪上印迹。事实不是这样。王璞牺牲后，我作为川东临委的唯一幸存者，主持了临委范围内的工作。但是大量的具体领导工作是照明做的。一则他具体经管的是敌人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和方向，二则，我是叛徒、特务追踪的主要目标，活动很受限制，许多事情不得不由照明代我履行职责。因此，当他把《巴渝鸿爪》的写作思路告我，并希望我参加写作时，我坚持由他个人撰写。他写成后，曾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照明的本意是“写大家”，只因体例是以他个人为主线，写他接触的人和事，对他不曾具体接触的地区和方面，自然略嫌不足。这是不能苛求的。

《巴渝鸿爪》在作者身后才出版，诚属憾事，但也因此便于后人评价。我觉得作者留下的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鸿爪，而是不可磨灭的铁血历史。它反映了城市民主运动的兴起扩大和主动转移，农村武装的准备、发动、失败及转变策略，迎接解放的部署与完成。就作者个人而言，不敢说是立给大众观瞻的丰碑，总可以说是供同志亲友怀念的墓志吧。1946—1949年是作者人生旅途的一小站，又是大时代的一角，内容极为丰富。其间，激昂和沉静，胜利和失败，惊险和平安交替，而最终闯过长夜，迎来黎明。一个人来到而立之年，就成功地对付如此复杂的局面，难道不是充分考验了

他的忠诚、才能、气质、品德和情操吗？

关于照明，纵写千言万语，犹感意犹未尽。在搁笔之前，我想再说一遍，命运叫他先我而去，还得由我为他的遗著作序，真是苍天无眼，宙斯失慧。安息吧，照明，待我们在泉台再聚共斩阎罗。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生前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部副主任，曾为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本书采用回忆录形式，以其亲身经历为线索，追述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我党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同蒋介石政权作艰苦斗争的事迹。

文章材料翔实，记叙生动，颇能引人入胜。

目 录

悼亡友邓照明·····	肖泽宽 1
前言·····	1
决定回川·····	5
红岩小住·····	12
在秀山的启蒙工作·····	19
向省委汇报·····	23
在黔江接头·····	28
秀山情况与组织撤离·····	32
被捕入狱·····	36
在敌特的政治部机关里·····	51
去黔江县中教书·····	62
摔破脑袋·····	66
接受审查·····	72
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78
去山后区视察·····	88
敌军对虎南区的围剿与撤离·····	93
重庆及川东党组织遭受大破坏·····	102

去广安见王璞·····	114
艰险的重庆恢复工作·····	118
去垫江·····	124
第二次去广安·····	129
华蓥山起义以后·····	132
艰苦斗争的继续·····	135
去上海找钱瑛·····	140
回渝后的工作·····	152
去铜梁会见肖泽宽·····	154
去香港见钱瑛·····	158
川东特委的工作·····	167
第二次去香港·····	172
去解放区·····	178
在武汉待命·····	181
在南京报到·····	186
向西南进军·····	190
回到重庆·····	196
会师大会·····	203
结束语·····	206

朝闻夕死也心甘

——为照明辞世而作·····张黎群 210

前 言

解放战争时期，也即是1946年1月至1949年12月，经党组织决定，我被调到川东地区和重庆市做地下党组织的工作。经过四年的艰苦斗争，1949年11月底，重庆市得到了解放。川东的其他县市，先后也获得解放。从此，一个旧历史时期宣告结束，新历史时期开始了。

1950年1月中，在中共重庆市委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解放军和解放区来的同志们与当时在重庆的地下党员会合。地下党组织从此结束，完成了历史使命，党员被分配到各地区及市军管会所属各部门，或机关、工厂、学校，积极参加各项建设工作。

按照组织原则，我们的党是高度统一的。就是说，不当分什么地上党、地下党，所有的党员，都根据党章，享有权利和应尽义务。我们，作为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严格认真地维护党的统一的。同时，我们当时也留心，不要被人

误解了我们在搞地方主义或分散主义的活动。我当时（解放初期）常对地下党的同志们说，地下党组织已经结束了，同志们如果有事往来，这是个人之间的友谊，组织关系已经没有了。我是这样认识，也是这样行动的。

实际情况，比我的认识要复杂得多。

解放以后，陆续不断、层出不穷地发动了许多次的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一来，就必然要审查干部，地下党员毫不例外，要接受审查。并且往往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我自己除接受审查外，还要为许多同志作证明，证明政治面目、组织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问题。通常的作法，是写证明材料。我的记忆力比较好，大凡经过我的人 and 事，我能记得，于是证明材料就写得很多了。来人调查或函索证明，我迅速写好交出。为哪些人写过证明材料，或证明过什么问题，我一概不留底稿，也不作摘记，写完交出了事。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了。确实，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段时间，被审查的人更多了，审查者也无数的多，各派“革命”组织，各种名目的战斗队，都可以审查干部。我被迫接待过许多调查者和索取证明材料的人，一般是接谈后，写出证明材料交给他了事。但是，也确实遇到一些不正常的人和事，大多是一些造反派，提出要求，证明材料要如何如何写，要我按照他的要求来证明某人某事，即是说，要用我的手写的东西来打倒某某同志。写证明材料是一件很严肃的政治行为，那样做当然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这时，我已被关进“牛棚”，在本机关造反派的监督下，与外来索取证明材料

的人接谈。这两方造反派都逼着我如何如何写。我说，既然你们对某人的问题已经清楚了，你们写就是了，何必再找我写呢？造反派说，要你写才行，因为你是当事人。我说，如要我写，就得按我所知道的情况写，不能按照你们指定的要求写。不然，我是不写的。他们说，你知道政策吗？“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若抗拒，后果由你负责。我说，那就请你们“从严”吧（我已经关进“牛棚”，“从严”无非是送进监狱，我作好了进监狱的准备）；于是，事情就这样僵持着，“从严”也搞不出什么名堂。后来还是本机关的人出面转弯，按照我的意见写出证明材料了事。这样的不正常的事，发生过若干次，来的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声色俱厉，我当时是将这些现象当演戏的场面。有一段时间，外调的人多，一天三五件，最多时一天六七件，匆匆写完证明材料就被拿走。我当时想留底或摘要都来不及。但是，给谁写了证明材料，至少要记下一个名字。于是我列了一张表，五人一行，只记一个名字。到1969年9月我作为“专政对象”被带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时止，我数了一下列名人数，共约500余人。其中，解放战争时期的，即为川东地区和重庆市的人作证明的约300余人。此外，这时对川东地下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非议与诬蔑，其中许多事，与肖泽宽同志和我有关。于是我感到，川东地下党的事，并不如我过去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它没有随着会师大会的举行和宣告地下党组织的结束而结束。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一切工

作与活动，逐步真正走上正道。从中央到地方，认真地征集党史资料和编写党史。在四川省与重庆市党史工委的主持下，我参与了党史资料的回忆与写作。有的老战友向我提示：你写了一些回忆资料，并为许多人写了证明，何不将这些东西联贯起来，把这个历史时期你所经历、知道的东西写下来，或者还有点用处，可供查考呢？我受到这个启示，趁现在记忆还清楚，用我的笨拙的笔，以简要朴素的文字，把这些事物记录下来。

从1946年1月算起，到现在已经40年了。一个人自然不会有几个甚至两个40年。但在历史的长河里，40年也还是短暂的。历史的长河，波浪滔滔，许多东西先后都被湮没了，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引起视觉暂留，也算是幸运。

读过一首苏轼的诗，《和子由澠池怀旧》，全诗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宋诗，常常被专家们讥为“味同嚼蜡”，但我觉得这首诗是有韵味有哲理的。下雪后鸿雁暂留爪痕，在太阳出来积雪融化之前，雪泥上还是留着爪痕的。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是车载斗量，恐怕不能与鸟类中的鸿雁比拟；不过，还是愿意留下一点痕迹，在日出雪融之前，留给愿意看的人。

决定回川

大约在1945年5月底或6月初，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前不久，廖志高同志和我谈过一次话（廖是“七大”大后方代表

团——也即是国民党统治区代表团四川组的组长，我是四川的一名代表），大意是：周副主席（即周恩来同志，当时党内对他是如此称呼，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意见，要在“七大”代表中挑选一部分不太红（即不太暴露）的人，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廖的意见，我在四川大学和成都有些暴露，但在四川其它地方，还不算很暴露，有回川工作的条件。他要我考虑这个意见。当时我想：四川的党组织培养教育我多年，从一个青年学生到一个党的干部，并选我作“七大”代表。我在延安学习好几年，中央组织部调我去敌后根据地的晋绥边区，担任宁武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学习了一套打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政权的比较系统的经验。现在党需要我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虽然那是很不痛快、很有